

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

陆学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农业连续6年大丰收。1985年粮棉突然大减产，面对这一事实，有两种不同看法。一部分同志认为，粮棉减产是计划安排的不必过虑；另一种看法是，不能小看这次减产，对农业不能掉以轻心。根据我在农村蹲点调查的见闻，认为1985年减产不是偶然的，当前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希望引起有关领导的足够重视。

一、对1985年粮棉大减产原因的分析

1985年粮食减产566亿斤，比1984年下降7%，棉花减产4,094万担，比1984年下降33.7%。一年减少这么多粮棉，这在建国后还是第一次。就粮食来说，建国36年，29年增产，7年减产，其中减产最多的只有1959年和1960年，分别比上年减少600亿斤和530亿斤，但这两年减产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1985年减产的原因，有关部门的同志分析有三条，“一是播种面积调减6,500万亩左右，改种了经济作物和其他；二是自然灾害较多，持续时间长，成灾面积比往年大；三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太猛，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使农民投入减少。”我认为这都没有揭示出这次大减产的本质原因，按上述分析三条原因中，自然灾害和调减播种面积是主要的。可是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报告：“六五”期间气候比较正常。“1981年部分地区春旱秋涝，1985年南旱北涝，这两年虽灾情较重，但没有出现波及全国的大灾年”。1985年是一个平年，全国旱灾成灾面积1.66亿亩，比1980年1.869亿亩和1981年1.819亿亩都要轻。1985年辽河、松花江大水，但比1981年长江大水；1982年黄河大水，1983年淮河、汉江洪水，1984年黑龙江大水受灾面积要小，灾情也轻。为什么1980年以来年年有灾，还年年大丰收，1985年灾情并不

建立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保持国内粮食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

4.17. 根据粮食购销放开后所能承受的能力以及可能引起的震动幅度，全部放开过程可以细分为六个步骤：①放开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粮食销售，如广东、福建等经济收入较高的地区。②放开工业用粮。③放开食品、副食品用粮。④放开饲料用粮和种子用粮。⑤放开非农业人口口粮。⑥放开贫困地区和救济贫困人口的粮食销售。

我们设想，实施上述改革，大体需要三年的时间。通过改革能够实现1990年粮食总产达到9,000亿斤的目标。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样的改革，大体上可以理顺粮食的购销价格以及生产、流通、消费三者的关系，使粮食真正作为一种商品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实现其自身的价值，而且可以顺理成章地实现经济、社会、政治三个目标，又不会发生强烈的震动，是比较安全、稳妥的实施方案。

重，反而大减产呢？据水利电力部同志讲，1985年辽河大水，流量2,000秒立米，并不是特大洪水，比1951年14,200秒立米，1953年12,100秒立米小得多。五十年代中期辽河安全泄量是5,000秒立米。1985年只有2,000秒立米就造成大灾，这同我们近几年水利设施失修是有关系的。我国幅员辽阔，水旱洪涝年年有，通常年景是有丰有欠，1985年的水旱灾害只是局部的，为什么除山东、河北、内蒙的粮食略有增产外，全国80%的省市都减产呢？在这种自然灾害并不严重的平常年分，粮食却在全国普遍减产，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985年粮食播种面积调减6,500万亩，这不是国家计划安排的，而是计划失控的结果。1978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8.088亿亩，1984年为16.9576亿亩，6年减少10,505万亩，年均递减1%。1985年一年就减少3.83%，超过往年递减数近3倍，步子跨得太大。为什么一年骤减这么多？鉴于棉粮库存过大，大量减种棉花。适当减少粮食种植面积是正确的。但由于上半年对粮食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放松了领导，特别是调整粮食收购价格和生产资料涨价，种粮成本高，收益低，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致使1985年粮田面积调减过多。这是粮食大减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为什么调整的规模失控，一年减少这么多粮田面积，这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切不要看成是偶然的，更不要把减产的主要原因归之于自然灾害，要作过细的调查研究。

1985年粮食大减产是一个信号，不要等闲视之，要看到这是我国农村出现的新问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连续6年增产增收，在较短的时期内，使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1985年突然大减产，会不会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关节点，从此又转入停滞徘徊的局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我们要正视它，解决它，引导农业生产朝着稳定发展的方向前进。

二、对1986年和今后农业发展的预测

有关部门估计，1986年的“粮食生产，现在看来回升的可能性较大”，“只要不发生更大的自然灾害，并在保护农民积极性方面适当地采取措施，恢复几百亿斤的产量是有希望的。”有的同志估计，“1986年的粮食生产，增也不会增得太多，减也不会减得太多。”这些短期的预测，有一定的根据。但是从发展前景看，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令人忧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所以有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是党的方针政策正确，改革了农村经济体制，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二是国家在1979年、1980年提高了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刺激了农业生产。三是建国以来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发展农机，提供大量的化肥、农药和优良品种，建立了推广农业科技组织，到1978年全国农村集体经济公共积累已达1,000多亿元，这些都是新的生产力，是农业生产的“老本”。因而才产生了连续6年的农业生产大发展。1984年粮食达到8,000亿斤，棉花1.2亿担和其它农产品均创记录的新局面。

1985年粮棉大减产，这是影响农业生产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它标志着这些年来，我国农业原有的生产条件和生产潜力的利用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而且有的生产条件在变坏，也就是说，“老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同时，由于生产资料涨价，多种负担加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没有进一步调动起来，反而有下降的表现。1985年的大减产正是这两个主要因素的反映。

1986年和今后的农业生产将怎样发展？决定于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主要因素的变化情

况。从这几年的趋势看，下列11个方面都是很令人忧虑的：

第一，耕地日益减少。从1980年以来，我国每年减少耕地1,000多万亩。四川省更为严重，1984、1985两年共减少耕地230万亩。由于城乡占地失控，滥占耕地的势头还在继续，而且都是高产良田。

第二，大量水利工程失修，灌溉面积减少。现在全国有50%左右的水利工程设施不能正常发挥效益，有70%的大中小水库带病运转，有43个大水库是重点险库。全国有机井255万眼，很多已淤塞无水，仅山东省1980—1984年就报废2.88万眼。灌溉面积自1980年以来每年平均减少700万亩。

第三，土地肥力减退，土壤恶化。这两年，农民无心种粮食，不仅有机肥少施，而且连化肥也用得少了。1985年全国化肥施入量普遍减少20%以上。据辽宁省统计，1985年氮肥少施26%，磷肥少施40%。南方不闾河泥了。农民不再进城镇挑粪，过去农民进城清厕买粪，现在居民给钱也不来。由于粮食不值钱，生产资料涨价，这两年农民是有水不浇，有肥不施，宁愿少产出，也不多投入。

第四，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于农业发展大为不利。据中国林学会第六次会议报告，近5年我国森林面积减少1亿多亩，平均每年减少2000多万亩，再过10年黑龙江将无林可伐。我国东北天然屏障正在受到严重毁坏，水土流失严重，每年有几十亿吨土壤流入江河，河床淤塞，不少河流正在由利河变成害河。西北、内蒙一带，沙漠扩大，沙进入退，每年减少耕地上百万亩。近几年农村乡镇工业发展，污染严重，又无力采取防污措施，现在不少县已没有一条净水河。

第五，实行责任制后，没有适应新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农业现代化政策。现在全国大中型农业机械，实际保有量和使用量均大大减少。许多农机需要更新大修，农民只使用不修，国家已无补贴，再过几年，大中型农机将损失殆尽。农民又不买新的，使一些大中型的农机严重滞销，好几个大拖拉机厂都在考虑转产。

这两年小化肥小磷肥和国产农药也出现全国性的滞销，仓库大量积压，致使许多小化肥厂、小磷肥厂和农药厂被迫停产。如果不制订新的农机、化肥、农药政策，我国的农用工业就汲汲可危，农用工业破产了，农业现代化还有什么指望呢！

第六，各行各业冲击农业，行行都比搞农业强，农民无心种田。农村放宽搞活以后，由于农产品价格低，搞工、商、副、服务等业都比搞农业收入多，所以凡有一点办法的都弃农去搞别的，农业上只剩下一些老头、妇女和孩子。城市郊区和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已普遍出现耕地撂荒现象，有的地区还出现转让土地倒贴钱的情况。农民无心种田的结果，是使原来像苏南、胶东和大中城市郊区等一类高产地区，近几年农业普遍减产，特别是粮食大幅度减产，一般都下降30—40%，有的已从粮食大量调出区变为粮食调入区了。

第七，农民负担逐年加重，已成为农村一个老大难问题。据山东省1985年对99个乡镇，3,845个村、71.6万户调查，1984年农民共有11大类96项负担。每个农民年平均负担53.8元，占人均年纯收入的11.5%，为各项农业正税（7.02元）的7.66倍。（按全国8.4亿农民计，全国农民在交纳农业税以后，还要交纳各种负担451.92亿元，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啊！）据调查，现在农村的负担，大多数地区都是按人头摊派，不分男女、老少、贫富，每人50多元（多者达百元），每户就是200—300元，有的上交后，生活成了问题，更多的是影响生产的投入，没有钱买化肥、农药。因而秋后收入也少，形成恶性循环。有位县的农工部

长对我们说，如果现在能豁免或减轻对贫困户的负担，那大部分贫困户就不贫困了，这是最大最有效的扶贫。

第八，农村的自然经济正在向商品经济转化，但流通体制改变甚小，农民买难卖难的问题有增无已。农民在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正在逐步由自然经济向商品性经济发展。但供销体制，基本格局未变；少了赶，多了砍的政策未变；官商经营作风未变，致使亿万农民望“市场”兴叹，面对瞬息变化的商品信息，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农村少数人能捷足先登，而绝大多数群众感到致富无门、销售无路，出现了卖猪难、卖兔难、卖蛋难、卖茶难、卖棉难、卖粮难！目前我国多数农民的农本很小，一次卖难，就可能倾家荡本，丧失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农民不仅卖难，买优良品种难，买优质化肥难，买低毒高效的农药难，买适用价廉的农具难。长期的买难卖难，直接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也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九，农民要扩大再生产，要发展商品生产，深感一家一户力不能行，许多事办不了办不好。迫切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服务、以解决农户在机耕、灌溉、收割和加工、储运、销售等方面的困难。农民对于合作、联合有着内在的客观要求。但是主观上却对以前的合作化有着痛苦的记忆，又怕回到集中统一的“大锅饭”年代。农民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第二次合作化。”农民的这种客观困难和矛盾心理，我们并没有采取措施及时有效地予以解决。下一步农村的专业合作、地区合作到底怎么搞好？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目前多数地区的合作和联合处于停滞、自流的状态。农业生产发展在客观上要求合作，这种要求得不到实现，也就必然影响农业生产。

农民要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经济，信贷资金的周转是不可缺少的。近几年农业贷款增加不多，特别是去年国家紧缩银根，首当其冲的是大量压缩了农贷，使正在转化中的农业遭到严重的困难。出现了国家收购粮棉不给现金，打白条，农民到信用社提取存款拿不到钞票。就是国家给一部分农业贷款，不仅数量少，而且大多数贷给乡镇企业和专业户，真正缺少农业生产资金的农户，却得不到农业贷款，这当然也就打击了农业生产。

第十，农村基层组织半瘫痪，干群矛盾有所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的经济基础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上层建筑也要与之相适应，要求县、乡、村（即县、公社、大队）三级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要有相应地变化。实际上，这几年在这几方面没有实质的改变，很不适应新的形势。据几个省的调查，目前农村基层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大约各占20%，许多村干部、党支部成员都外出经商做工去了，乡党委，乡政府开个干部会也召集不起来。这种瘫痪、半瘫痪的地方，农村工作无人过问，为农户服务的一类事更谈不上，就是勉强能维持门面工作的，由于对新形势下如何领导组织好农业生产和有效的服务，多数人也是感到束手无策。但是，不管瘫痪半瘫痪或勉强维持工作，干部们的补贴还是沿袭人民公社时的老办法照拿。这些都是向群众摊派的，也是群众负担的一个重要方面，约占多种负担总数的15—25%。另外，近几年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也有所抬头，农民群众同干部之间的矛盾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干部中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侵占、挪用、贪污原来集体的财物；多占宅基地；低价承包集体的农机、房屋和社队企业；截留、多占国家给农民的平价化肥、农药、贷款、救济；在农民办的企业中入干股分红，排斥打击农村中的能人。他们在承包时，多分好地、好农具、好牲口，他们的关系多、门路广、信息灵，可以借到贷款和搞到物资，所以一部分干部富得比群众快，专业户、万元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来的或现任的干部。并出现了新的强迫命令和滥加处罚群众（罚

钱罚粮)的问题。所有这些使目前农村中干群矛盾有所恶化,不少地区还出现干部打群众或农民打干部的问题,干部逼群众、农民仇杀干部全家的恶性案件也有发生。

第十一,最大的忧虑是自上而下不重视农业,不安排农业投资,农民也不投资,不搞农田基本建设。我国早在五十年代末就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新贡献。但在实践中却常常轻视农业,只有当农业出现困难时,上下才重视农业。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对农业投资很重视。1978年农业投资为53.34亿元,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10.6%,1979年为57.92亿元,占11.1%。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农业决定提出,农业投资要逐渐提高到占基建总投资的18%。可是联产责任制实行不久,国家就大量减少农业投资,1981年只有29亿元,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6.6%,以后逐年减少,1985年仅占6%,据说“七五”计划只安排200亿元,只占基建总投资5,000亿元的4%,实在是太少了。

国家投资减少,地方减少得更多。如四川省1979年农业投资占全省总投资额的11%,1983年降到3.5%,1986年安排还要下降。福建省1978年的农业投资占全省总投资的19.85%,1985年只有6.6%,1986年予算安排只有2.85%。江西省1978年的水利投资为7,200万元,1985年只有2,500万元。地区和县的财力有限,拿不出钱来进行农业基本建设,而且往往还把上级拨下的农业投资挪作他用。山东惠民地区1980年水利投资2,200万元,1985年减到231万元,减少89%。这样少的水利投资,维护都难保住,更谈不上发展了。而农村的集体经济大多数已经没有经济实力去从事农田基本建设,就连小型水利的维修、沟渠、机井毁损严重也无力解决。农民这几年经济情况虽有所好转,但也不向农业投资,一是,怕政策变,总觉得土地不是自己的;二是,家底太穷,有一点钱先要造房子、置家具;三是农田基建投资大个人无能为力。但更主要的是靠农业致富不容易,所以他们不向农业投资。有资金也是去从事商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等,最后才是向农业投点资。据对山东陵县144户农户调查。1984年人均纯收入为559元,平均用于生产积累的只有51.5元,占全年纯收入的9.2%(主要是用于购买牲畜和农用机械)。目前我国农业正处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阶段,农村的水利、电力、机械、交通、仓储、加工服务等等的现代化设施,都需要大量投资才能建立起来,不投资或少投资,实现农业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农业固定生产资金的稳定增长是现代化农业稳定增长的基础。1977年美国拥有农业固定资金1,974亿美元(不包括房、地产)与1950年相比,平均每年增加60亿美元,递增率为6.7%。1978年美国1美元农业产值,有1.86美元农业生产固定资金作后盾。(西德为1:3.35)。而我国1983年农业固定生产资金1,141亿元,比1978年增加164亿元,平均每年增加32.8亿元,递增率只有3.2%,每元农业产值的物质装备基础只有0.40元。比美国、西德等相差很大。这是靠活劳动的增加投入来弥补,但不能长久维持。1985年的减产,正是农业物质基础削弱的表现。

上述11个方面的问题,综合起来看,主要还是两条,一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这几年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加强,反而在几个重要方面削弱了。二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的挫伤。要保持农业稳定持续的发展,这些问题必须及早解决。1986年及今后农业生产将怎样发展?取决于我们为增强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下的力量和进一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和措施。

三、近几年农业基础削弱的几点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农村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但是，这个伟大实践中，也有失误。为了使农村改革能够继续深入，更好发展农村的大好形势，及时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第一，对农业形势估计过好。长期以来，解决几亿人民的社会温饱问题，我们曾采取过很多办法，但农业总是徘徊不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发展很快，这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的。但是近两年农村出现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和村庄，特别是出现了一些万元户，就认为农村富得很了，农民很有钱了，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已经过关了等等。这是对我们贫困了几千年的十亿人口的大国，建设农村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过高的估计了农村的大好形势，过高估计了农村改革的成就，过高估计了农民的富裕程度。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年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不提了，不少支农的项目撤了。财政上支农产品补贴取消了，农机补贴没有了，对贫困社队的救济扶持款改为贷款了，供销社专门扶持和指导农副业生产的支援资金也取消了等等。而且各部门都想借助农民的力量，多办本单位的事，如教育部门要改善办学条件，广播电视部要普及有线广播，能源部门要办沼气，卫生部门要搞计划生育，军事部门要办民兵训练基地……都是要农民出钱的。这几年农民的负担成倍地上升，据调查，农民60%的负担是中央和省两级以红头文件下达的。1977年以后，年年讲要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为什么年年在加重，这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大问题。

第二，削弱了农业的基础。近几年我们不仅没有在财政上，信贷上支援农村的改革，反而大大减少了对农业的投资和多种补贴。这不仅削弱了农业的基础，而且对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的合作经济体制的巩固和发展是极不利的。列宁说：“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许多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并使它实现。”（《列宁选集》第4卷第683页）但是我们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开始普及的1981年，就大量削减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以后又减少或取消了各项支农的基金和补贴。当时有一种论点，认为农业靠政策，靠调动农民积极性就行了。实践证明，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第三，对农村第二步改革心中无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其效果十分显著，我国成功的实现了农村的第一步改革。但是，农村第二步改革是什么？至今莫衷一是。有的说第二步就是产业结构调整；有的说下一步改革是农村流通领域的改革，有的说是发展商品经济；有的则说农村第二步改革已经实行过了，就是人民公社改为乡镇，大队改为村。总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多数地区在等待观望。因而使许多应该解决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些地方还有走回头路的。

第四，农村合作经济体制怎么完善和发展，在理论上未弄清楚。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也未制定相应的政策，以致在实践中放任自流。农民需要合作但又怕合作化。而我们的领导看到不搞合作不行但又怕提出合作，加重群众怕变的心理，影响生产。看来，抓这个问题现已晚了两年。一是客观上需要，要使农村实现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就必须搞合作。二是为保护原有的集体财产，也必须抓。目前许多农村原来的集体财产损失很大。据统计，集体经济原有积累1,000多亿元，有500亿已分包到户，因多种原因损失一些，现在只剩300

多亿了，而且还在继续减少。怎么用好管好这笔公共积累，也是我们农村工作的一大任务。

第五，城乡改革不同步。农村实现了第一步改革之后，出现了商品生产大发展的势头，客观上需要城市改革以致国民经济整个体制改革与之相适应。要求在市场机制、购销制度、价格体系、流通渠道、交通条件等方面有相应的改革，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但城市改革既复杂起步又晚，而且又往往首先考虑解决自身的问题，较少考虑如何面向农村，适应农村改革的需要。时至今日，城乡通开，城乡一体的问题并未解决，农民买难卖难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这一步改革局限于农业，独立性强。第二步改革要大力发展农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步改革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复杂，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多个部门，以致涉及到上层建筑部门。这些部门的改革跟不上，改不好，农村的改革就会受到阻力。这几年农村改革进展困难，源出于此。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全面展开，如何使城乡改革同步进行，互相促进，有些问题是需要专门研究解决的。

四、几点建议

1985年粮棉减产传给我们一个信息，应该通过它看到目前农业面临的严峻的形势，纠正对农业发展不正确的看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巩固和发展农村的大好形势，加强农业的物质基础，制止农业将会出现的萎缩、徘徊的趋势。为此提几点建议供领导决策参考。

第一，要统一对于农业问题的认识。对于农业基础的削弱，对于农业发展面临着停滞、萎缩的危险，农口的不少同志是看到了，但是农口的同志和其它部门的同志之间、领导与领导之间、上下之间在农业问题上看法还是不同的。建议中央能像1981年那样，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和骨干到各地农村去，就水利建设、粮食状况、土地管理、流通渠道、合作体制、乡镇企业，农用工业、农民生活状况等问题进行实地的调查。以统一对农村形势、农村改革和农民富裕程度的认识，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研讨各行各业支持农业，加强农业基础的战略措施。

第二，要制订增加对农业投资的具体方案。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农业要现代化，要持续稳定的增产，不增加农业投资，不改善农业的物质基础是达不到的。1981年以来削减农业投资是一个大的失误。前几年农业这架机器带病运转，光吃老本，这样下去是难以为继的。不要等到农业不行了，到那时不仅花的钱会更多，而且在政治上的损失也会更大。特别是水利等的建设，不是当年投资就能见效的。1990年计划生产9,000亿斤粮，现在就该下本钱了。要下决心给农业投资，第一步，农业基建投资恢复到1979年占国家基建总投资11%的水平，第二步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农业决定要求的18%的水平。另外还要重申各省市自治区，要把地方财力的50%用到农业上。

第三，要拯救、振兴我国农机、农药和化肥等农用工业。中国农业要现代化，要靠我国自己农用工业提供现代化生产资料武装，靠进口是不行的。但目前我国的农机工业，小化肥工业，特别是农药工业，面临停产、转产、破产的危机，不能适应农村市场的需要。国家又大量减少对农用工业的投资，1978年农机、农药、化肥工业投资为21.51亿元，占全国基建投资的4.3%，1983年降到7.16亿元，只占1.2%。国家还取消了对农机购买修理的补贴，外贸部门大量进口农药，使国产农药滞销。要解救农用工业目前的困境，必须制订新的方案，才能使农用工业振兴起来。

第四，妥善解决好粮食问题。从目前农业发展趋势看，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农村经济形势很好，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很快，但农业下来了。二是农业形势好，牧业、渔业、副业发展很快，但粮食紧张。我国是10亿多人口的大国，靠买进口粮吃是不行的。我们吃了20多年进口粮，苦头尝够了。如果拿外汇买外国人的粮食，不如投点资拿人民币买本国农民的粮食。实践已证明，我们的耕地，养10亿人口是没有问题的，不必靠进口。

粮食问题说到底是个价格问题。如与工业品相比，农产品价格低。（1980年后，主要农副产品价格稳中有降，工业品普遍调高，这5年剪刀差又扩大了。）在农副产品中，粮食价格最低。（据江苏调查表明，现在种1亩粮食的年纯收入是100元，种1亩棉花是200元，种1亩桑养蚕是300元，种1亩瓜是400元，种1亩菜收入500元。）农民种粮吃亏，因而普遍不愿意种粮食。今年准备采取措施稳定16.5亿亩粮田面积，减少定购粮食基数、实行以工补农，以工补粮，对卖粮农民奖售优质化肥等，这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理顺价格关系，制定正确的价格政策。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

一是改革粮食作为特殊商品的地位，粮食购销价格都要放开，有计划、有步骤地按照价值规律进行调整。这是根本出路，但这样做，涉及的方面很多，要从长计议。

二是先调整收购价格。把1,200亿斤合同定购数作为任务分配下去。对各地区和农民在合同定购以外交售的粮食，国家按不同的地区，分别加价收购。使加价收购价大致等于市场价格。

三是把粮权逐步放给各省。国家对各省规定调拨基数和粮食购销补贴数额，其他都由各省自己决定，包括自定购销价格，各自解决好本省的粮食问题。

四是在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保持农产品总的价格水平的条件下，适当调整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比价。把1983年以来调减棉花等农副产品价格的钱，用来提高粮食价格，改变粮价是锅底现状，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第五，积极稳妥地完善农村合作经济体制。要在领导干部和群众中统一思想，为理论上认清农村合作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弄清这次完善合作体制决不是走回头路，重复人民公社吃“大锅饭”那套做法，而是要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发展新型的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形式，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实践上，要分地区，分阶段，有计划地进行。切忌再犯一哄而起的错误。

第六，1980年以后，全国每年冬天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交流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上下沟通，集思广益，研究解决新问题的政策和措施，形成新的农业文件，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领导农村工作的一种好形式。鉴于农村问题复杂繁多，诸如：农业投资；农村流通体制，供销社改革，粮食购销，土地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农民负担，剩余劳力转移，乡镇企业，农村合作体制，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县级体制改革等等，都应该解决。但一次会议，不可能都解决，有些问题，提一下，泛泛讨论是解决不好的。建议今后每年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选择2—3个问题，事先安排，做好调查研究，准备好各种方案，专题讨论，定出比较彻底解决问题的政策，形成文件（有些可形成法律草案提出有关部门）使这些问题逐个解决，把我国农村现代化事业一步步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